

A Study on the Building of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Center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广州国际商贸中心 建设研究

产业与区域发展视角

张 昱◎主编

A Study on the Building of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Center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广州国际商贸中心 建设研究

产业与区域发展视角

张 导◎主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研究:产业与区域发展视角/张昱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36-0517-5

I. ①广… II. ①张… III. ①国际贸易中心—研究—广州市 IV. ①F752.8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5560号

责任编辑 师少林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0517-5/F·8764

定 价 58.00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68344225 88386794

本书获

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

资 助

／ 前 言 ／

广州自古就是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与贸易重镇,享有“千年商都”的历史美誉,纵观广州的发展历史,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繁荣兴旺的商贸活动始终是广州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担当了率先开放、引领中国内陆城市走向世界的重任,并逐步发展为中国南部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确立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特色定位的过程中,广州市最终将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确定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愿景,并将其写入《广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并确立了具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以此推动广州的转型发展。无论是从广州千年商都的历史传承与创新,还是从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来看,建设国际商贸中心都是广州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焕发新的活力,提升中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集聚辐射能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州应发挥崇商、重商的历史传统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活跃自由的优势,通过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汇集全球高级生产要素,以繁荣开放的商贸活动带动城市经济的转型发展。

从当今世界著名的国际商贸中心的共性来看,广州要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必须具备若干关键要素。一是功能强大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以金融、知识产权、信息技术、会展、物流等为内容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控制全球产业链核心价值的关键行业,并决定了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与影响力。二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为特征的现代商贸模式。现代商业活动借助互联网络、物联网络和金融结算的创新,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商业活动的制约与边界,只有现代商贸模式得到充分发展,才可能在现代国际商贸中心城市中占据稳固的位置。三是广大的经济腹地和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商贸中心的经济聚集能力和强大的商贸服务功能都需要通过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和周边的广大腹地来实现,经济繁荣、功能互补的周边城市群和海陆空立体综合的运输系统是国际商贸中心显著外部特征。四是足够的价格影响力。定价权是反映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与市场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国际商贸中心的中心性集中反映为其对国际市场的价格影响能力。综合来看,广州目前尚未完全具备上述要素。

为了探索广州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过程中的具体现实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组织研究人员,进行了课题招标立项研究,其中部分选题,是基于广州市主要领导批示进行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是初步探索,因此我们将关注的

重点放在了经济转型的重点——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由于中国的中央及地方政府历来对于产业发展方向存在较强的干预性,因此我们首先探讨了政府实施产业干预政策的可行性,梳理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手段和干预机制的长短期经济效应,以此作为对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产业篇的开篇。然后,分别就广州当前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领域,比如会展业、金融业、服务外包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对策进行了研究。

此外,我们还从区域的视角对广州城市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譬如,针对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心性问题,通过城际航空网络数据及首位联系测定,分析了中国城市网络结构以及广州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地位,尽管研究仅基于对航空数据的分析,但为中国城市网络以及城市能级测定与评价提供了科学的视角与研究方法,也为广州城市地位的研究留下了更多的可能空间。针对广州开发、发展的热点,我们还关注了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建设发展的内在政策需求,提出了系列设想和具有分析依据的政策建议。为了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我们还对若干国际大都市的转型升级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此为广州建设发展国际商贸中心提供相应的启示与建议。

本书的研究报告均基于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 2011 年的招标课题成果,随着广州城市建设的推进和主政者思路的调整与明晰,新的热点不断涌现,新的数据、观点、理念层出不穷,因此,本书中相关专题的研究尚需不断跟进与更新,对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和国家中心城市的研究也应不断持续深入。

我们愿以此书为广州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为广州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2013 年 5 月

／ 目 录 ／

★ 第一篇 产业发展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当前中国产业政策的模式选择	3
1. 产业政策有用吗：一个文献综述	3
2. 产业支持对象的普遍性：选择性或普惠性的产业政策	4
3. 政策作用的市场端口：供给扶持与需求引导	7
4. 要素的流动性与政策效果：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	8
5. 产业政策的退出机制	10
参考文献	10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广州产业体系中的地位与成长机制研究	12
1. 产业升级实现途径的理论发展	12
2. 二战后美欧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演变	16
3.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与特征	19
4. 广州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与制约因素	22
5.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广州产业体系中的定位	33
6.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广州产业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带动机制	34
7. 广州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	44
8. 广州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取向	47
参考文献	50
广州会展业经济拉动效应与结构优化研究	52
1. 主要研究思路与内容	52
2. 会展产业对经济拉动效应的研究现状	54
3. 会展产业的关联效应与会展经济的运行原理	56
4. 广州会展业的基本特点及在国内的产业地位	60
5. 广州会展业的客流聚集效应	68

6. 广交会与广州旅游业关系的回归分析	73
7. 广州会展业对广州旅游业的拉动效应	76
8. 广州会展业的贸易流拉动效应	83
9. 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与会展业的发展	85
10. 广州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会展业结构优化	92
参考文献	99

广州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机制研究

——兼论广州国际服务外包与国际商贸中心的关联性	102
1. 广州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业与打造国际商贸中心的背景与关联	102
2. 研究服务外包的文献综述	104
3. 广州开展国际服务外包的条件与现状	108
4. 广州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空间布局	111
5. 广州国际服务外包产业重点招商区域及重点发展类型与发展路径	112
6. 广州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策略	116
7. 广州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120
参考文献	123

广州推动金融创新的对策研究	127
1. 广州推进金融创新的战略意义	127
2.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金融创新经验	132
3. 广州推进金融创新的基础与局限	146
4. 广州推进金融创新的对策措施	154
5. 广州推进金融创新的政策环境保障	157
主要参考文献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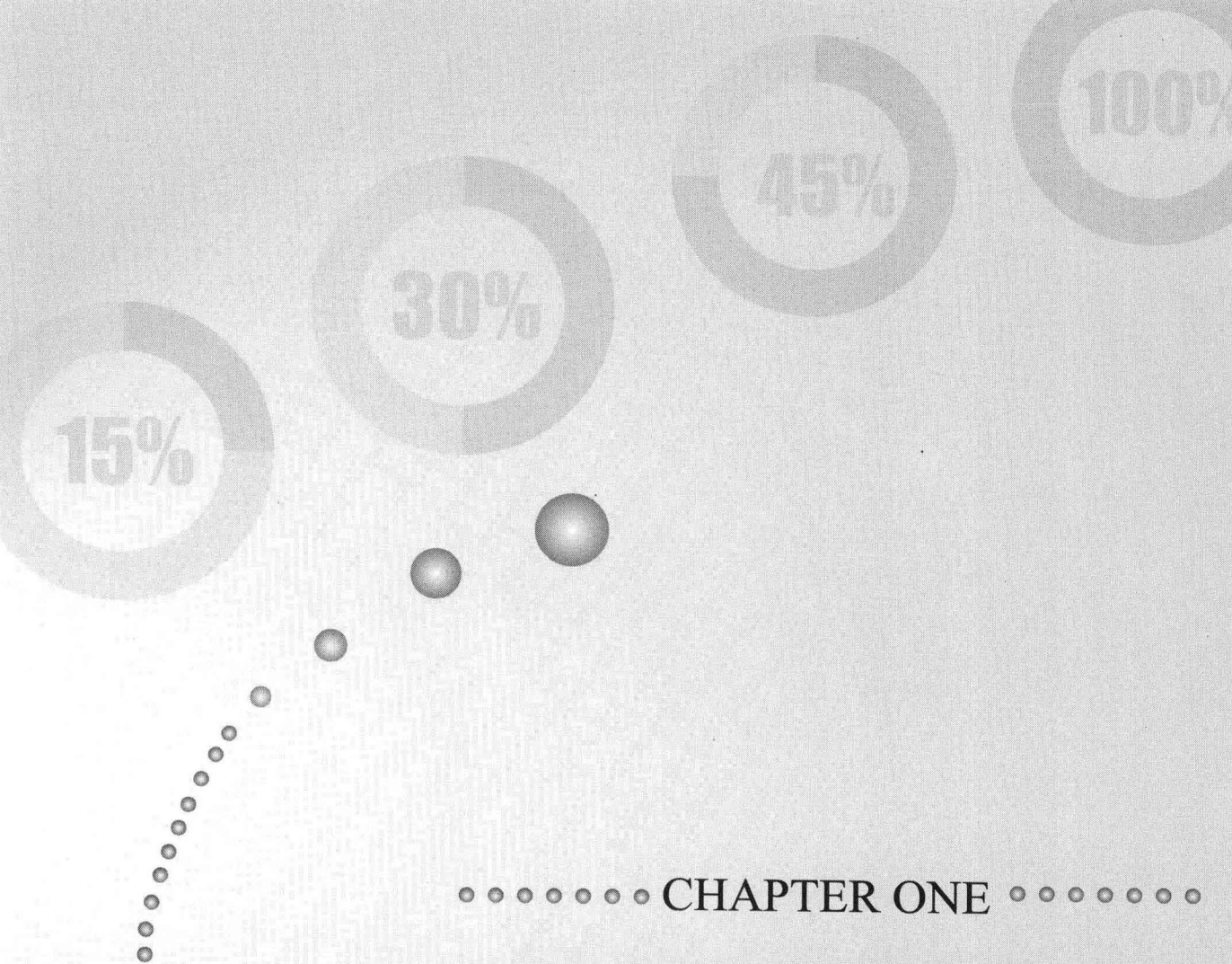
第二篇 区域发展篇

广州在中国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地位研究	167
1. 引言	167
2. 文献回顾	168
3. 中国的城际航空网络	170
4. 城际航空网络中的“轴—辐”系统	178

5. 广州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	182
6. 结论	186
参考文献	187
南沙建立自由贸易园区的优势与政策需求研究	189
1. 世界自由贸易园区的分布与分类	190
2. 世界代表性自由贸易园区介绍	192
3. 国内竞争地区分析	203
4. 南沙建立自由贸易园区的条件优势	209
5. 南沙建立自由贸易园区的政策需求分析	214
参考文献	223

★ 第三篇 经验借鉴篇

国际大都市发展转型的经验与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	227
前 言	227
1. 世界商品贸易中心城市的演变	228
2. 国际大都市发展转型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启示	233
3. 国际大都市发展转型关键因素研究及广州的战略构想	246
4. 从“自由成长”到“科学构建”——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整体 对策框架	254
5. 通过超大型项目带动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的突破	262
参考文献	267



..... CHAPTER ONE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产业发展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当前中国产业政策的模式选择

张 昱

1. 产业政策有用吗：一个文献综述

中国的产业干预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政府基本移植了苏联模式,采用价格和数量控制等严格的行政手段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产业政策一直是政府干预的重要内容。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一个重要的预设性命题是:政府政策干预对产业成长过程而言是否是必要的,或者起码是有利的?大量实证研究试图对此给予回答。Beason, Weinstein 以相关政策工具(如 JDB 贷款、净补贴、关税保护等)为自变量,研究了 1955—1990 年日本各产业的增长率,认为:日本各工业部门生产率的进步只有 7% 左右能够被产业政策解释;对电气、通用机械以及交通运输机械等行业而言,产业政策与生产率之间甚至是负向的相关关系;总体上讲,日本产业政策对于日本各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1]。Micheal Poter (2000) 对日本主要行业的产业政策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表明,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受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小,而产业政策干预越多的行业反而越没有国际竞争力^[2]。竹内高宏(2002)对日本在国际上成功的 20 种产业和失败的 7 种产业进行了详细比较后,也认为,日本成功的产业大多没有产业政策的支持,而失败的产业恰恰是产业政策管束过多,特别是限制竞争较多的部门^[3]。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产业政策是必要的。Ito (1992) 认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的产业政策有效地提升了日本产业部门的生产率^[4]。Amsden (1989), Wade (1990), 杨汝岱与姚洋 (2008) 等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数据的研究均认为产业政策的存在有其必要性^{[5][6][7]}。Brander and Spencer (1983, 1985) 在两篇影响力颇大的论文中证明,政府的产业政策如出口补贴、进口限制、投资或研发补贴可以起到打击竞争对手、保护本国企业优先进入某些特定行业的作用^{[8][9]}。林毅

夫(2007)认为,如果遵循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不对市场特别是投资行为进行任何干预,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比发达国家更为频繁的周期波动和金融、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中,企业面临的是技术、市场比较成熟,已存在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对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容易产生共识,在行为上反映为投资的“潮涌现象”,即短期内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继而诱发经济波动。因此,合理的产业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是必要的^[10]。潘士远、金戈(2008)也持有相同的观点^[1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Tetsuji Okazaki(1996)对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政企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与企业对于政策目标达成共识、信息的对称以及政府有力的制度条件保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12]。陈钊等(2011)认为,政府产业干预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产业政策有效的前提条件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制订相应的产业政策^[13]。白雪洁(2008)以日本代表性产业组织政策为例,提出产业组织政策成功与否与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及每一阶段企业的行为密不可分^[14]。周叔莲等(2008)认为,高增长行业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与行业本身的技术属性及产业政策的动态调整有关^[15]。

综合前述研究,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宏观上的外在干预,“适宜”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个别产业或整个产业体系的健康成长与新陈代谢,抑制过度波动,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控制竞争格局的战略性手段。但“不适宜”的产业政策可能反而会起到干预竞争、扭曲市场机制,因而有损效率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产业政策可以是有利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适宜的”或者说是“有利的”呢?

2. 产业支持对象的普遍性:选择性或普惠性的产业政策

总观各国产业支持政策不难发现,某些政策设计是针对特定的产业(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行业中的特定企业(如大型国有企业)提供的排他性的激励,而某些政策的设计则是对所有行业和企业提供不定向的、普遍的激励。Lall(1994)将产业政策分为“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16]。冯晓琦、万军(2005)认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部门性的产业政策”是以特定的产业为扶持对象,其政策功能是主动扶持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缩短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而“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是以市场失败为理论基础,其政策功能主要是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17]。

本文认为,从支持对象的普遍性角度,可将产业政策分为选择性产业支持和普惠

性产业支持两大类。选择性的产业支持是指,政府在对产业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主观判断和决策的基础上,运用政策力量对产业进行定向性选择,集中资源支持某些产业(企业)。如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和中国为保证冷战格局下的国防安全,依靠限制非公有经济、以农补工、工业生产向重工业倾斜等方式,快速建立起以国有经济为主的重工业基础。与此对应,普惠性产业支持则是指面向所有的产业(企业)的开放性的扶持政策,政府并不取代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而是着重为所有产业(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公平、有效的竞争平台,其在政策原理上基于对市场本身所具备的选择与淘汰机制的承认和尊重。中国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正是一种普惠性的制度变革,从产业支持的意义上讲,是由单一的国有经济准入和严格的行业限制向多种所有制、全方位产业开放的转变。我们从多个方面探讨了两种不同类型产业政策思路的合理性。

首先,从判断产业发展方向所需的信息基础和风险而言,政府并不适合扮演比企业更积极的角色,除非在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企业作为经济末梢和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往往比政府更直接地感知市场的变化,并且具有更加灵活的调节手段来适应这种变化。从判断失误可能产生的后果而言,动用公共资源投入不确定性较高的技术和产业领域极易引发质疑,失误产生的损失也往往是巨大的;而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能将损失控制在所有者和债权人的范围之内,风险显然要小得多并且更加可控,因此,企业更适合作为风险的承担者。例如,虽然苹果计算机公司曾因产品不适合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濒临破产,但丝毫无损美国计算机及软件产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而当苹果公司依靠创新的产品设计重新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则更加强化了美国在该产业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如果政府确信能够掌握比企业更加全面的信息,一种开放而且建设性的做法是,建立多种信息来源,广泛支持公共和私有机构的产业研究,并通过公共平台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企业,由企业结合自身所掌握的市场信息自行做出投资决策,而不是直接进入特定领域或指明产业方向。

第二,普惠性的支持政策鼓励竞争,选择性的支持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损竞争的公平性。选择性支持的对象集中在特定的微观主体,不论倾斜对象是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或是特定行业,都难免产生替代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损害竞争和效率,诱导垄断和寻租行为的产生。而普惠性政策强调企业间自由竞争在形成产业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尽可能考虑对公平竞争所造成的影响,对企业和行业采取广泛而开放性的支持,从基础上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和竞争活力。比如政府针对企业研究开发、技术革新活动予以普遍的税收和信贷支持,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企业实施补贴。由于计划体制的惯性,中国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广泛、细致和直接,带有政府意图的管制性特征突出。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政府的产业干预有必要实现

由产业(企业)选择动机向产业(企业)扶持、培育动机的转变。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证明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性产业政策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不同影响。我国汽车行业曾长期实行高关税保护、重点倾斜“三大三小”、限制其他资本进入等典型的选择性政策,结果是企业长期在政策的保护下,市场竞争能力逐步退化,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低下。加入 WTO 后,行业限制逐步开放,外资大量进入本国汽车市场,以合资方式与本土汽车制造商设立合资品牌和合资公司,同时民营汽车企业如吉利、奇瑞、比亚迪等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多种资本并存、多品牌竞争的行业结构。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中国汽车行业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2009 年中国首次成为汽车产销的世界第一大国。

第三,普惠制的产业政策容忍多元化,有利于创新行为的繁荣。选择性政策强调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无论如何设计,总是存在对选择范围外的经济活动的排斥性,不利于多元化的发展。普惠性政策在设计原理上宽容多元性,只要在法律和体制允许的范围内,企业的经济活动是自由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是多维的。多元化产生的技术溢出和乘数效应有利于产业创新,有利于减弱经济波动,也有利于基础性研究的应用性转化并反过来推动基础研究,从而形成产业与研究的良性互动。

第四,选择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效果不同。处于“赶超”阶段的经济体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比较容易依据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来选择产业发展方向,从而缩短产业升级的进程,避免“潮涌现象”带来的经济波动。而由“赶超”阶段过渡到“领先”阶段后,由政府来选择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面临的不确定性要大得多。如日本在上世纪 90 年代步入世界一流经济强国之后,政府耗费巨资研发第五代巨型计算机,企图占领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前沿,不料整个世界的信息化技术向个人计算机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政府对产业技术发展方向判断失误,第五代计算机技术未出襁褓便遭淘汰,不仅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还使日本错失了在新技术领域领先世界的良机。因此,欧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将具有普惠性质的竞争政策作为市场经济有效运作和产业部门有序竞争的基本保证。

综上,我们认为,短期而言,选择性的产业支持能够较快地实现政府在某些方面的特定目标,但从长远而言,普惠性的产业支持更有利于市场经济前提下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和经济活力的提升。由于计划体制和“赶超思维”的惯性,中国的产业政策往往选择性特征突出,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行为边界模糊,行为方式粗放。随着市场运行日趋成熟,经济由“赶超”向“领先”的临界点接近,产业政策的设计有必要向更加开放和长效的思路转变。

3. 政策作用的市场端口:供给扶持与需求引导

除了计划色彩浓厚的行政管制,市场经济前提下的经济政策不外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端口与市场机制对接,产业政策也是如此。侧重供给扶持的产业政策以生产者激励为特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支持特定产业或企业,鼓励其扩大生产;侧重需求引导的产业政策则将着力点集中在使用者或消费者身上,通过对特定消费行为给予补贴,或直接通过政府采购,为被支持行业创造需求、扩大市场,从而间接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从逻辑上分析,对于出口部门或出口导向型经济而言,其对区内市场依赖程度低,政府在主观上具有通过出口拉动经济的动机,在客观上也不太可能对区外消费者直接施加影响,因此其倾向于供给端激励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以区内市场为主的内源性经济或产业部门,产业政策的可选择范围则更广泛一些。为了验证这个逻辑判断,我们比较了日本和欧美的产业政策及其形成背景。

日本的产业政策具有典型的供给端扶持的特征,而这与其“贸易立国”战略与出口导向的产业特征密不可分。研究表明,1946—1975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但从1956年开始进入了国内供给过剩的阶段,1951—1955年间,日本资本产出系数约为1:1,但是从1956年开始下降到了1:0.6,这说明制约增长的已不再是供给,而是需求(下村治,1962)^[18]。生产能力日趋扩大的国内生产部门迫切需要找到消化其过剩产能的出口,而拥有巨大消费力的美国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市场。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大力引进世界尖端技术水平的资本设备,促进国内产业部门的转型升级;二是鼓励现代化投资以提高国内产业的生产率水平;三是通过低汇率(1美元=360日元的固定汇率)补贴出口企业。通过这些措施鼓励出口、改善贸易收支,成功实施了其“贸易立国”的战略,建立起以钢铁、船舶、汽车、电子等为支柱产业的极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中山伊知郎,1959)^[19]。可见,以供给扶持为显著特征的日本产业政策,正是在国内经济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过渡、产出由以国内市场为主向以国外市场为主的背景下产生的。

反观欧盟和美国的产业政策方式及背景则截然不同。美国在二战以后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拥有活力充沛的国内经济和巨大的本地消费能力;而欧洲国家在二战后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以关税同盟为主要内容的统一大市场逐步形成并在此后不断扩大,持续深入的一体化降低了同盟内部的交易成本,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强劲。广阔的内部市场吸引了欧美产业政策的重心,加之自

由经济的传统,形成了以需求引导为主的产业促进方式。政府引导需求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补贴消费者。例如,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在1978年的《能源税收法》中明确规定纳税人用于其房屋购买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设备的开支可从当年缴纳的所得税中予以抵扣;为鼓励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7 000美元的抵税额度;欧盟国家通过广泛实施高福利政策对区内经济实施注入,极大地促进了内部需求。二是基于产业目标的政府采购。如美国政府通过《购买美国产品法》、《小企业法》要求行政机构优先向本国供应商、中小企业倾斜,并通过“提高技术标准”、“增加检验项目”、“技术法规变化”等方式提高外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入门槛,保护国内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科技的黄金时代”;美国政府耗资巨大的太空计划更是其航空航天产业领先世界的直接驱动。欧盟各国通过政府采购促进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做法也由来已久,上世纪50—80年代,瑞典政府成功地通过政府采购促进了许多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在IP电话技术还未进入实用领域的情况下,德国海德堡市市政府作为先行用户,成功地推进了IP电话技术与传统电话网络融合的突破。

日本和欧美不同的产业政策作用方式证实了我们的逻辑推断,即以外部市场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或产业,比较适合从供给端给予扶持,而内部市场广阔,产业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的经济体,其产业政策在需求引导的方向上存在更大的空间,并且因其对市场的干预是间接的,因而“试错”的风险也更低。

从中国政府的产业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前期,经济的出口导向特征明显,因此主要采取了对特定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如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在税收、金融、政府补贴等方面的直接支持,供给端扶持的特征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同时,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红利与低成本优势在不断弱化,出口导向战略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长期策略。事实上,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中国巨大的内部市场为产业政策在需求引导维度上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需求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制约因素,充分重视国内市场,积极引导内部需求,更新消费理念、提升消费层次,将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

4. 要素的流动性与政策效果：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

从实施主体来看,产业政策可分为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由于关境、货币等形成了商品和要素流动的硬约束,因此,国家层面产业政策的资源配置效应,主要是资源要